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四期 ——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1a)

【人物春秋】	程世清沉浮录 (上)	李意根
【是非功过】	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	陈 昊
【史海钩沉】	陈云“文革”后期提议加强黄金储备	姜长青 • 陈 渊
【研究动态】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讨会	汤 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春秋】

程世清沉浮录 (上)

• 李意根 •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建国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邓小平、陈云等被“流放”江西时，他正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与邓、陈有过来往；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于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讣告寥寥数语无评价。

◇ 从“红小鬼”到高级将领

程世清幼时由于家庭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后改为红11军31师）在他的家乡河南新县柴山堡开辟革命根据地。1929年他刚满11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队伍，被编入光山县独立团当传令兵。年轻的程世清颇有文艺天赋，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也能表演快板、活报剧等。1931年10月，他被编入红25军

7 3 师 2 6 7 团宣传队任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提升为宣传队分队长。后参加了双柳树、泼皮河、英山、固始等战斗。

1 9 3 2 年夏，国民党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转移外线西征。根据规定，年龄太小的儿童团和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于是程世清便被疏散回家。1 9 3 2 年 1 1 月 2 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 2 5 军。听到消息后，程世清便来到檀树岗投奔。师长徐海东看他机灵，留在了身边。就这样，程世清归队的第一天就和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结了缘，成了徐海东身边的小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艺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徐海东便把他安排到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在这期间，他和写标语的宣传科科长、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1 9 3 4 年 1 1 月，他随红 2 5 军主力北上长征，翌年初到达陕南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8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到达陕北后，红 2 5 军、2 6 军、2 7 军合编为红 1 5 军团，程调任 7 8 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 9 3 6 年夏，参加了东渡黄河抢占离石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程世清任八路军 1 1 5 师 6 8 8 旅 6 8 7 团宣传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长。1 9 3 9 年后，先后任 6 8 8 旅独立团 1 营教导员，冀鲁豫支队 2 大队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 3 师 8 旅 2 3、2 4 团政治处主任，转战在苏北、淮安等地。1 9 4 3 年 2 月，程世清与新四军 3 师彭雄、田守尧等 1 1 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行船到小沙东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的巡逻艇立即靠了上来，日军小队队长带着翻译官登船检查。化装成船老大的程世清将刚跨上船的敌人推入水中，并迅速将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投向甲板上的敌人，炸死炸伤多名日军。战斗中，程世清作战十分勇敢，是幸存的 5 名团以上干部之一（1 9 5 5 年授衔时 1 人被授予中将、4 人被授予少将）。同年 1 1 月，程世清等一行人历经艰难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 9 4 5 年 8 月，日军投降后，程世清奔赴东北，奉命组成长白支队，负责接管长春到白城子一线的安广、大来、前郭旗、扶余和农安等县伪满政权，组建了一支 2 0 0 0 余人的武装部队，至 1 9 4 6 年 8 月部队发展到一个建制团，程世清任团长兼政委。以后历任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 1 3 2 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广州等战役和佛山、英德、韶关等地区剿匪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世清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 9 6 3 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 6 军政治委员。

◇ 诬告许光达大将，进入林彪的视野

程世清在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期间，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涉及到他的顶头上司、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

原来 1 9 6 3 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之事，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这份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林彪此时因病请了长假休息）。不久，程世清调任济南军区 2 6 军政委，离开了装甲兵。然而世事难料，文革还未开始，罗瑞卿就被打倒（1 9 6 5 年底），林彪重新主持军委工作。1 9 6 6 年 8 月，程世清前往青岛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文件，号召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提意见。济南军区首长指名让程世清提意见，曾为军委装甲兵政

治部主任的程世清便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一道上书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旧事重提，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与苏联人员交往密切及仿效苏联实行一长制事，称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处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

客观地说，程世清第一次报告是出于组织程序，也是他的责任所在；而第二次旧事重提，还断定许光达会将“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则有投机、夸大和捕风捉影之嫌，事实上给许光达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刘秉荣著的《贺龙姐弟》记载：1966年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要夺取政权”，说“贺龙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以林彪的“指示”为依据，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机关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5月11日，装甲兵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7月5日，成立“斗许、张专案组”。8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即程世清、罗通1966年8月写给军委的检举信），林彪很赏识。”根据叶群的说辞，8月12日，许光达被隔离关押审查，后来惨遭迫害致死。

可以肯定的是，程世清因这封信得到了林彪的赏识，从此开始进入了林彪的视野，开始了他后来广受诟病的“辉煌人生”。然而，许光达事件也是程世清后来获罪的最主要依据。文革后期程世清被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发出的（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于起诉决定书》指出：“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接到《决定书》以后，程世清没有提请上诉，当即被释放。

◇ 江西“支左”：平息武斗、恐怖“三查”、办汽车厂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

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未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玉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

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以后根据可靠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产品要创新，要出新玩意儿。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

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仿制苏联嘎斯。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程世清对这件事大力宣扬。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引起了全国震动。由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党中央声音。

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压力非常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5个重点，都是程世清亲自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还有双马石汽车厂等。这些汽车厂都需要国家投资。实际上所产汽车质量并不好，到处抛锚。

胡亮考察后觉得行不通，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

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因此，他们就跟江西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井冈山。但机械厅不敢做主，因为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考察组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沟通，井冈山汽车厂的负责人就秘密向程世清汇报：“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程世清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根本就不听胡亮的汇报。

◇ 紧跟林彪，“改造”井冈山历史

程世清与林彪关系到底如何，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他一方面对林彪大捧特捧，另一方面又和林彪毅然决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一段时间内，程世清是紧跟林彪的。

程世清原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由于当时程世清并不是一个高级军官，林彪是否熟悉他不得而知。两人关系被广为人知，始于196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据传这篇文章是程世清自己写的。文中极力吹捧林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给林彪、也给程世清脸上贴金。此文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如果说程世清第二次揭发许光达才被林彪注意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就使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公开化，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林彪线上的红人。

1968年，为了突出林彪，程世清下大力进行井冈山形象改造。当年春，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于是，“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南昌起义的巨大功绩抹煞了，有关红5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4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4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遮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的那棵榉树下小憩。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成为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师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即后来的井冈山烈士陵园）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

洋界上立起了高达20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11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与此同时，山上、山下发动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8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颌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3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阙《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3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阙《西江月·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 与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的关系

1969年林彪关于紧急疏散的“一号命令”发布后，邓小平、陈云、王震被下放到江西。在邓小平、陈云二人的传记或讲话中都提到过程世清，而《王震传》中则没有涉及。

邓小平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说邓小平夫妇马上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说：“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350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知道是周恩来的交代后，程世清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

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指示，程世清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23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到南昌步校后不久，程世清便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前来看望。对于邓小平，程世清虽然没有当面严厉地斥责这个“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却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次，程世清连称呼都没有地对邓小平说：“你来江西七八个月了，有什么体会呀？”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程世清自讨没趣儿，便调转话题，大谈特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以及他在江西的“政绩”。但是自始至终，邓小平一言不发。谈完了自己的功绩，程世清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程世清又羞又恼，尴尬地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还不到10分钟。程世清离开时，和他一起来的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在江西省革委会的指示下，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要求：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新建县委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有黄文华（江西省革委会派出“明保暗监”的邓小平的管理秘书）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由于采取了比较周密的“保护”措施，邓小平自己除了一次在劳动中晕倒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基本上实现了程世清对周恩来的承诺——“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几个子女至少是在程世清的默许下，进入了江西的高校就读，成为大学生。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是另一个下放到江西的中央级领导。

初到江西，根据程世清的指示，陈云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后来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的情况不同，是属于疏散的中央领导，而不在被“打倒”之列，因此，程世清对陈云还是比较尊敬的。邓小平、陈云来到南昌后，程世清先见了陈云。不知是出于表功还是表态，程世清见到陈云后，就开始大吹特吹起来，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

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并说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1963、1964年发展速度太慢。

不过，在程世清眼里，陈云毕竟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礼节上的尊敬外，并没有特别热情的交往，有一次遇到了还避而不见。那是1969年11月13日，陈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6日，程世清为了某种武器的制造和生产到该厂视察金工车间。很巧，陈云也正在金工车间。厂领导请示程世清见还是不见陈云，程世清很干脆地表示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工作人员喊来，要他设法使陈云“暂避”程世清。工作人员很为难，无奈之下，请陈云上楼休息，领进一个小房间。这时，程世清才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给主管经济的陈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970年，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所谓“新村图”。该政策的具体做法是：在“八”字形的山谷上端，建一个小水库——“一口塘”，用于蓄水，“一口塘”的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在山坡上盖起了一些简易农舍，强行把一些农民搬迁到那里，而后就是等待上级的“检查验收”。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于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还有新农舍被洪水冲了个精光，农民又回到了他们祖居的地方……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就批评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代。”

1979年，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批评了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 庐山会议——毛泽东语“炸平庐山”及林彪的变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为了确保此次会议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出了纰漏，引出了当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为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和接待服务工作，成立接待委员会，由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马志勇组成。下设6个组，交通组、警卫组、物资组、秘书组、医疗组、通信组。

根据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20多公里，定了350个哨位，布上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个哨位，布上200名战士。此外，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对于程世清这一亲自设计并监工、几乎一只野兔也溜不过去的无形巨网，毛泽东身边的汪

东兴却看出了一个天大的漏洞。

庐山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看到安排给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解释道：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又问：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告诉程世清，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问：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

回到杭州后，汪东兴将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马上问道：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在这头电话上感叹：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来马上询问已由广东调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程世清没有料到，这个直升机场本是由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两位一起勘察地形后定下的，江西方面不过是组织施工而已，但经汪东兴这一报告，却在毛泽东心里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作为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人员 and 高级干部。文章指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因此，“欺骗了不少同志”；批评陈伯达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9月6日全会的闭幕式上，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次年毛泽东南巡，在长沙时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等人谈话，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时，又再度点到：有几位大将，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

本打算修建好后由几架伊尔—14和云雀直升机来值班的庐山小机场，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炸平庐山”的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说出这句话，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机场炸山的影响。

1970年庐山会议，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的压力非常大。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晚上，程世清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主席汇报了有关疑问，特别是他对叶群的一些疑惑：叶群常以为林立果找对象的名义，派人在各大军区乱窜，实则是与各大军区拉拢关系。程世清特别向毛泽东讲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冈山时告诉他，林彪家里有三派——林立衡说自己属于中间派，林立果和叶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后，程世清建议毛泽东留下，到南昌住几天，再和林彪谈谈。毛泽东听后对他说：“林彪啊，还是要保的。”并同意在南昌住下来，找机会和林彪再谈谈。

程世清当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别墅。想不到在304别墅先遇见叶群，她正在手忙脚乱指挥着工作人员清理东西。林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程世清进来，点点头。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庐山问题没有完，搞不好会涉及党内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经将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两天，和主席谈一谈？”林彪点头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这个情况连夜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书就火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带着夫人刘秋萍赶紧前去，一见到林彪，就问道：“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叶群听到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要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哑口无言，只好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变化这么快？”

上午8点30分，林彪离开庐山。林彪从防弹车中探出头来，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浓眉肃目，脸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后来，程世清一直为当初没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对采访他的人说：“如果那天林彪留下来就好了！”

（未完待续）

□ 《文史精华》2008年第11期

~~~~~

## 【是非功过】

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

• 陈 昊 •

### ◇ “四人帮”要搞掉华国锋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

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 ◇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师，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

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 ◇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当时，党和军队内很多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都与叶剑英或者相互之间商讨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才名正言顺，才合乎党法。华国锋心中也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后，华国锋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于9月11日郑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把解决“四人帮”的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接受华国锋的委托后，于9月13日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不久，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虽然大家没有深谈，但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

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可见，那个时候，华国锋不但再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而且已经争取到了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

#### ◇ 亲自坐阵怀仁堂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9月末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10月4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10月6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7点55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 ◇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

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1976年10月27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

□ 《党史文苑》2008年第21期

~~~~~  
【史海钩沉】

陈云“文革”后期提议加强黄金储备

·姜长青·陈 渊·

黄金储备，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它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文革”后期，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并把握住国际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推动中国政府大量增加黄金储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为新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准备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 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

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协定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三个协定的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即黄金官价为每盎司（合28.35克）35美元；其他成员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并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即实行固定汇率制）。三个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损害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稳定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本流动而展开的货币战，并最终导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问题。70年代，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在此形势下，黄金储备

量作为国际储备的一个部分是衡量国家财富的一个方面，黄金储备量高则抵御国际投资基金冲击的能力加强，有助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有助于维持一国的经济稳定。由于黄金的优良特性，历史上就一直充当货币的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黄金与美元脱钩，黄金的货币职能虽有所减弱，但仍保持一定的货币职能。

目前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储备中，黄金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黄金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本身具有价值，故购买力相对稳定；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价同步上涨；在通货紧缩时，金价不会下跌。因而，历史上每逢政治和金融局势动荡，就会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

对一个国家来讲，黄金是作为具有无限权威性的储备资产。拥有黄金的国家不必惧怕别国政府作出的任何有关变更黄金价值和改变黄金使用条件的决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或任何一种国家货币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外，由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同样也会引起货币的不稳，并促使物价上涨，而黄金对这些似乎并不怎么敏感。黄金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借贷关系基础上的储藏手段，黄金的持有者不会因国际银行体系发生变化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金融动荡、美元同黄金脱钩而且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当时，陈云多次建议，将手里的外汇多买些黄金储备起来。1973年7月14日，他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汇报时，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陈云看到了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价格避险的功能，指出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大多通过中间商进行，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我们过去有时只顾完成商品采购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利用交易所，就是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他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 陈云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对发展对外贸易一直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指出：“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20世纪60年代，为缓解粮食紧张的局面，陈云提出并亲自抓进口粮食的工作。为了提高进口粮食和机器设备的外汇支付能力，他又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争取多出口创汇。

“文革”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南昌，到工厂“蹲点”。陈云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并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这可以从陈云给女儿的信和陈云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1970年12月14日，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说：“订一份《参考消息》，这可以知道世界大势。不知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

陈伟华回忆道：“一天，吃过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给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制订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和国内纠正极左思潮，为从西方国家较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创造了重要条件。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引进工作的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结算方式除单机按现汇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这在当时都缺乏经验。为此，陈云亲自对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并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金融等问题的研究。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3年6月，陈云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这个趋势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现在距离列宁所讲过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陈云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十个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

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当有人讲到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在国内碰到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这样做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等问题时，陈云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由于陈云的支持，1973年筹措到大量外汇资金，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

1973年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外贸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

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 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

◇ 陈云建议增加黄金储备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符合实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

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他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黄金联系在一起了。他设想，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

1973年6月7日上午，陈云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即：（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及其黄金储备；（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三）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四）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七）美国和日本、英、西德、法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八）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估计；（十）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弊。谈话中，陈云还指出：人民银行要把在“文革”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任务。

1973年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黄金价格还要上涨。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付款，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

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陈云在1983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

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987年12月18日，陈云在同胡启立谈话时指出：1981年，我说国家有120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储备不算多。但那时对这些外汇和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项历史决策，其作用往往影响很深远。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愈加显示出陈云在“文革”后期为中国黄金储备增加所作出的正确判断。

□ 《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

## 【研究动态】

###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讨会

· 汤 伟 ·

美国的纽约大学最近举行了一次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历史遗留的财产（Art and Politics, Lived Experience, Legacies of Liberation）学术研讨会。发起这次讨论的是纽约的几家美国组织——纽约大学公共知识机构（Institute for Public Knowledge—New York University）、革命书籍（Revolution Books New York）、以及国际人文中心项目（A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背景是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这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全球正在向左转”。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出现巨大奇迹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抗议的活动时有发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 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之一、美国Drew大学（Drew College）中文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棣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因并非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变革的承诺经过17年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兑现，而被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毛泽东急于改变现状，实践他的文化革命的理念，因此发动了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实际开始于1964年关于文艺方向之争的阶段。毛泽东一直认为：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在抗战的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之际，后方的艺术家还在大肆描写风花雪夜。这个时候人民需要的是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艺术普及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是歌、舞、还是美术，都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艺术家们也甘愿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推广。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无法企及。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的时候，当演奏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

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而是物质主义至上。社会不稳定、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也许邓小平是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白猫黑猫的理论。中国现在无疑在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美国Warren Wilson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韩东屏说：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现，这就是现在中国划分的新租界，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

柏棣教授认为：文革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今中国的物质主义思潮又到底能够走多远？看看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对过去的总结正是为了面对现实，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分化。

## 二、文革的历史作用

### 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

曾经撰写过关于中国文革的艺术等系列文章的美国作家Li Onesto认为：文革使中国的妇女获得了彻底解放。中国女性在历史上受尽压迫，对妇女实施的残酷的裹脚，就是历史上压抑她们人性的象征。毛泽东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办幼儿园、食堂，使中国的女性从家务负担不仅身体上、而在思想上彻底获得解放。柏棣教授认为：文革时期妇女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 文革时期艺术服务人民、歌颂人民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舞蹈和艺术政治的Aly Rose认为：没有纯粹的艺术，艺术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期，中国的艺术起到了服务政治和服务人民的作用。根据她的研究：例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文革期间，中国用文化艺术统一了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走到了塞外边疆。全国的老百姓天天唱样板戏，令百姓的生活很有生气、很振奋。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完全商业化、庸俗化、金钱化，艺术作品和老百姓无关，丝毫没有起到为政治为大众服务的作用。

### 文革普及教育和文化、人们普遍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念

韩东屏教授认为：中国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和今天的美国教育制度形式上几乎没有区别。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很少。而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普及到每一个村社、中学免费、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甚至超过现在。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学家Raymond Lotta认为：文革普及文化教育，普通百姓得到扫盲、工农兵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今天，教育机会不均等，普通人根本受不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 文革使干群关系融洽官员廉洁腐败减少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期间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对于防止政府和群众关系的紧张和干部的腐败，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规定县级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百天以上，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更多。韩东屏认为工分制是世界上一种最平等的制度。今天官员腐败，贪污腐化，干群关系紧张和官员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有关。

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L i O n e s t o 认为：文革至少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向后推迟了 1 0 年。文革使中国社会得到进步。

韩东屏认为：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今天中国的犯罪率远比文革时期高；文革中没有娼妓，今天的中国娼妓横行；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平高于今天，如今道德沦丧；文革期间社会问题远没有今天的社会问题这样严重。

与会发言的人们认为：当前苏联垮台时，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弃置不用了。人类的历史往往会呈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情况。如今，面对西方的日益衰落，有人提出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时候了，至少证明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

这也是近年来在美国第一次公开组织的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的研讨活动。活动组织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重新认识评价中国文革活动的深入进行。

□ 寄自美国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